



危机往往引发恐慌，恐慌常常期盼安稳，安稳容易认可强权，强权则可能导致专制，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舞台曾经反复展演的活剧。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20世纪初叶爆发的经济危机、法西斯主义恶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接踵而来。

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不断持续的经济危机之中。意大利1920年便爆发经济危机，持续达两年之久。虽然1923年-1929年意大利经济有所恢复，但好景不长，1929年-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马上使意大利的对外贸易下降60%，国内下降40%，工业生产下降50%，投资减少50%，失业人数增加约250%。英、美、法从1913年-1929年事实上也处于经济萧条时期，因为虽然这一时期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1.5%、3.1%和1.5%，但这三个国家的工资年均增长仅为1.1%、2.2%和0.37%，这表明民众购买力非常疲软。1929年-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三国雪上加霜，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6.2%，英国下降了

16.5%，法国下降了37.2%。日本早在1927年就爆发了金融危机。1929年-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工业生产下降32.9%，农业生产下降40%。德国1917年经济已趋于恶化，虽然从1924年-1928年德国经济一度出现繁荣，但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就使德国经济凄惨。从1929年到1932年，整个德国生产下降了40.6%，仅次于美国，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。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人数的43.8%，加上其家属占德国总人数的四分之一。这些失业和无业人员在危机中走投无路，成为纳粹党煽动和争取的对象。如果没有从1929年底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对德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，纳粹党也许会四分五裂并淡出人们的记忆。

与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相伴而来的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活跃。1919年意大利、1919年匈牙利、1919年奥地利、1919年罗马尼亚、1919年德国、1923年保加利亚、1923年-1932年英国、1926年波兰、1929年芬兰、1930年比利时、1931年荷兰、1931年

丹麦、1933年挪威、1933年葡萄牙、1934年西班牙、1925年法国、1933年瑞士、1933年捷克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法西斯组织。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上也出现了“爱国勤劳党”、“血盟会”、“国粹大众党”等法西斯团体。

虽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思潮到处泛滥，但在不同体制的国家和不同素质的民族那里，法西斯主义者的命运

却是截然不同的。在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最为完备的美国，

似乎就没有出现过法西斯主义思潮；在资产阶级民主历史悠久的英国，“法西斯联盟”在选举中一再失败，最后随着其头目莫里斯因违法被捕入狱宣告灭亡；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几经波折幸存下来的法国，法西斯组织被犹太人所迫，政府总理勃鲁姆当机立断地解散。除了德、意、日之外，其他法西斯组织或者不成气候，或者借助希特勒政权外力苟延残喘，或者只是昙花一现，只有德、意、日三国的法西斯势力较为长期地盘踞了政权，给本国乃至世界酿成了大祸。

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

这三个国家得手？毫无疑问，广泛的民意支持是法西斯政权建立和延续的重要基础。除了日本法西斯是通过自上而下途径上台之外，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都是通过自下而上途径上台的，即通过民众选举掌握议会多数拥有上台条件的。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，纳粹党共获640.96万选票，107个议席，由最小的党一跃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。在1932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，纳粹党获得230个议席，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。这两次选举都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进行的，是比较正常的选举，反映了当时的民意所向。从1930年起，纳粹党外围就形成了紧紧跟随的各个利益群体的社会组织：希特勒青年团、民族社会主义妇女团、民族社会主义机动车驾驶团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法学家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技术联盟、德意志劳动阵线、德国粮食总会、德国文化总会等。德国人民当年错误地选择了希特勒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。（上）

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人，我的大姐钟雪影，在度过九十岁生日后，已于11月23日安详地告别人世。

我们姐弟四人出生在强敌紧逼、国难当头的上世纪二十年代。大姐比我大六岁，我与大姐手足情深。在她还很小的时候，就帮助母亲，照顾三个弟弟。当时我们生活很困难，记得许多个深夜，她总是在帮助母亲，糊火柴盒或锁扣挣钱贴家用。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一个个上了大学，她却在读完小学就不上学了。我们三人又先后入党、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，常在家接头或秘密开会。聪明细心的大姐，早有察觉，却坦惊受怕地为我们保守秘密。一次我藏在贴身内衣的一个秘密文件，大姐帮我洗衣服时打湿了，她把它晾干，又不声不响地放回我的衣袋。1942年，敌伪统治下的上海环境日益险恶，组织决定我和一些干部撤退到新四军第二师的抗日根据地。当时根据地急需一些药品，我托人带信出来，大姐告诉父亲，父亲欣然同意并积极操办。

1947年秋，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决战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进行大搜捕。我在上海主编的宣传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的刊物《青年知识》被查觉，特务直接侦查到我家，大姐机智地迅速通知负责刊物发行的弟弟，我和弟弟都撤离上海。被逮捕的一些同志，后来都在临解放时被杀害。

1949年上海临近解放，党组织调我回上海，筹划迎接解放的宣传。我们组织了上海人民宣传队，印制了大量传单、标语，绘制了巨幅领袖画像。当时需要一面巨幅红旗，我告诉大姐后，她立即告诉在绸缎庄当会计的姐夫，带回整匹的红绸。大姐和妈妈、姐姐以及舅母，连夜缝制。1949年5月25日，上海四周的枪炮声还在激烈地响着，当东方一轮红日升起，人们抬头看到在最醒目高处的跑马厅钟楼，上海人民宣传队员已挂上了鲜红的解放大旗。

解放了，大姐也理应与大家一样过上幸福的日子，大姐却把她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，送到新疆最偏远的城市喀什工作。之后，又先后把念完中学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送到了安徽农村插队。我与大姐有比手足之情更深的感情，但建国初期，我就被调到北京工作，之后我们夫妇双双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很少与大姐联系。恢复工作后，一心扑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上，很少去看望大姐。今年正逢大姐九十华诞，我克服行走的困难，与老伴一起到上海看望大姐，一起高兴地照了像。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留影。

大姐的一生是平凡的，她只是默默无闻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正同我们中华民族许多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一样，祖国鲜红的大旗上，也印染着她们的热血。我于是以《大姐与第一面红旗》为题，写了这篇短文，以作深切的怀念。

2007年11月27日

危机考验民族素质

郝铁川

人的天性

黄惟群

澳洲小学生上课是不坐椅子坐地上的，这坐地上还不是坐得整齐，直看成排横看也成排，而是零零落落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像一盘毫无规则倒撒在地的棋子，有精彩的，甚至横躺在地，手掌朝天，好似有人正在替它拍照。初见这般情景觉得有些震惊，可久了，惯了，渐渐还觉出了那么点独特的澳洲味：放松，随意，不拘一格，颇近自然。想来也是，人的天性中，本来就没那么多的一本正经、规规矩矩。

每天接儿子，我一般不朝教室里望，怕的是影响别人上课。但是，就算瞥，不自觉也会瞥上几眼。

常见儿子有个动作，很怪：头抬起，目光直直地望着老师，身体、颈脖挺直，右手食指也挺得直直压住嘴唇。手指动作有点像请大家不要出声，在发“嘘——”的声音。开始我认为，大概儿子准备发言，想请老师注意，那压住嘴唇的食指跟着就将随胳膊举起。这很好。儿子天生胆怯，我向来鼓励他胆大些。可久了，我开始起疑：怎么这么巧？每次轮到我瞥他，他都正巧准备发言？仔细回想，似也从没听到过他的发言声。下次去接他，离教室远远，细加观察，一观察，我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了。回家路上，我问儿子，为什么你坐

“你呼唤我，我呼唤你，军号把我们集合在一起。无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。虽说是岗位不一样，官兵情，战友爱。胜似亲兄弟。”这是流传在军营里一首脍炙人口的歌，字里行间透出的是浓浓的官兵情谊。

在武警崇明守岛兵的荣誉室内，完整地保留着51张特殊的药方，见证着一段不寻常的官兵情。

一位老队长的爱人因为身体原因，结婚多年没有生育。面对心爱的妻子的不停的自责，中队长也一度感到苦恼和焦虑。虽然平日里，队长把自己的辛酸藏在心灵的最深处，在战士面前像没事人一样。他和战士一道踢球，一起训练，中队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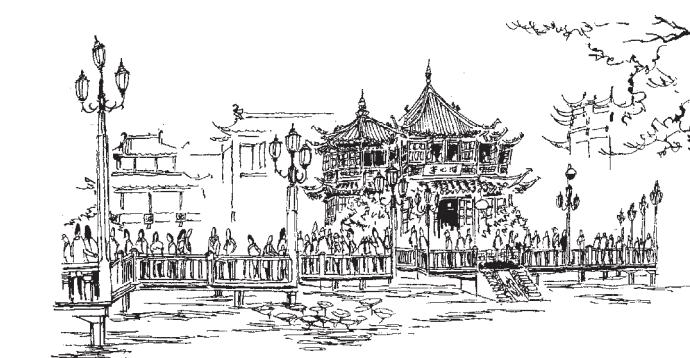
得那么直，还用手指压住嘴？Nothing，儿子避而不答。我不放过他，说：“你是想引起老师注意，博得她好感？儿子耸耸肩，不否认，也不说承认。

我说：“你不需要这样做，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你是怎样的就怎样的，拿出你本来的样子来。你那模样看上去很蠢，知道吗？”我的话说得较重，因为我历来讨厌讨好人的，甚至讨厌讨好好的样子。

儿子改了，之后不再那个动作了。

儿子平时一直得奖，可那以后，奖也得了。我问儿子：“是否你近期表现不好？”儿子否认，否认得肯定。跟着委屈道：“你叫我不要那样，That's why！”我还没醒悟，女儿一边接口显起聪明来：“是呀，你叫他Don't do this，”她也那样食指唇上一按：“他不Do了，所以，老师就不给他奖了。”两人一搭一档，先是把我搅得慌，跟着又使我忍不住“噗哧”一下笑出声来。

见我笑了，儿子觉得有了松动余地，歪头问：“如果我喜欢，还能那样做



钢笔画

上海城隍庙九曲桥

杨秉辉 文\画

上海旧城厢有城隍庙，近年香火颇盛。其侧有豫园，为江南名园。明代潘允端建于嘉靖三十八年，至今已400余年，几经兴废。潘氏系上海人，曾任四川布政使，后告老还乡，建园以“愉悦老亲”。因“豫”与“愉”相通，故名豫园。园内有点春堂、得月楼、鱼乐榭诸景。有一巨型太湖石名“玉玲珑”，传系宋时花石纲之遗物。1956年重修，将荷花池、湖心亭、九曲桥隔于园外，昼夜开放，任人游览。故民众皆以城隍庙九曲桥名之。

吗？”女儿跟着一边哄求情：“Please, please, let him do it……”

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半天没打住，本想说：靠这种讨好人的样子得的奖，我们不稀罕。可不知怎么，话到嘴边却成了句玩笑，我说：“你那样子确实非常Stupid。但你如果实在想那样做，那就随你便；不过，一星期最多一次……”

我自己都搞不清这究竟是因体谅儿子，不许究竟是因体谅儿子，不想让他太失望，还是觉得一人一星期做一次傻事不算太过分，或是自觉自己

太专制、太武断——也许他并不想讨好谁，只是认真听讲时一个随势动作？再要不就因想到澳洲社会本就讲究随意，这该也算是随意的一种？

后一次去接他，又见到他那挺过头的坐相和压在唇上的手指。我笑笑，转过身去。可意外的是，就在转首之际，我突然发现，所有坐在儿子后面的同学，都学着他的样，一个个坐得挺过头，一根根手指也都那样挺得笔直地压在嘴唇上，神情比我儿子还要认真十倍……

一次，说到历史上的生存状态，觉得小康于人生较为合理。贫苦人所不堪。不要说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就如颤回在陋巷，一点饭，一瓢水清淡度日，一般人也受不了。

富贵须用极大的精力去支撑。利益所在，众所争夺；登高而危，自然之理。《通鉴》中记载着一些皇帝子女说：以后生生世世不要生于帝王家。战国时苏秦也曾感慨，要是靠城边有一些田产，就不佩六国相印了。

小康则处于余与不足之间，无须为衣食奔波操劳，为保持既得而焦心苦虑。小康之人生活不匮乏，有人的尊严体面，所消耗为人的正常温饱需求，不挥霍，不浪费。

助寻医问药，寄来民间偏方和中草药，就连指导员也加入到寻医找药的行列，他联系到崇明前哨农场的一位老中医定期为队长家属调理诊治。前前后后，51份药方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一起。这51份药方，药方的内容不大相同，到底哪一份药方起到了疗效，大家不得而知。但在不久，队长羞涩地告诉战士：嫂子有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产房传喜讯——嫂子生了。休假的队长在遥远的电话那端，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远在岛上的兄弟。“苍天不负有心人”，大家为此都乐开了怀。

当提着一大兜红鸡蛋回到岛上的队长刚刚踏上码头，就



大姐与第一面红旗

钟沛璋

我们姐弟四人出生在强敌紧逼、国难当头的上世纪二十年代。大姐比我大六岁，我与大姐手足情深。在她还很小的时候，就帮助母亲，照顾三个弟弟。当时我们生活很困难，记得许多个深夜，她总是在帮助母亲，糊火柴盒或锁扣挣钱贴家用。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一个个上了大学，她却在读完小学就不上学了。我们三人又先后入党、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，常在家接头或秘密开会。聪明又细心的大姐，早有察觉，却坦惊受怕地为我们保守秘密。一次我藏在贴身内衣的一个秘密文件，大姐帮我洗衣服时打湿了，她把它晾干，又不声不响地放回我的衣袋。1942年，敌伪统治下的上海环境日益险恶，组织决定我和一些干部撤退到新四军第二师的抗日根据地。当时根据地急需一些药品，我托人带信出来，大姐告诉父亲，父亲欣然同意并积极操办。

1947年秋，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决战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进行大搜捕。我在上海主编的宣传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的刊物《青年知识》被查觉，特务直接侦查到我家，大姐机智地迅速通知负责刊物发行的弟弟，我和弟弟都撤离上海。被逮捕的一些同志，后来都在临解放时被杀害。

1949年上海临近解放，党组织调我回上海，筹划迎接解放的宣传。我们组织了上海人民宣传队，印制了大量传单、标语，绘制了巨幅领袖画像。当时需要一面巨幅红旗，我告诉大姐后，她立即告诉在绸缎庄当会计的姐夫，带回整匹的红绸。大姐和妈妈、姐姐以及舅母，连夜缝制。1949年5月25日，上海四周的枪炮声还在激烈地响着，当东方一轮红日升起，人们抬头看到在最醒目高处的跑马厅钟楼，上海人民宣传队员已挂上了鲜红的解放大旗。

解放了，大姐也理应与大家一样过上幸福的日子，大姐却把她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，送到新疆最偏远的城市喀什工作。之后，又先后把念完中学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送到了安徽农村插队。我与大姐有比手足之情更深的感情，但建国初期，我就被调到北京工作，之后我们夫妇双双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很少与大姐联系。恢复工作后，一心扑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上，很少去看望大姐。今年正逢大姐九十华诞，我克服行走的困难，与老伴一起到上海看望大姐，一起高兴地照了像。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留影。

大姐的一生是平凡的，她只是默默无闻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正同我们中华民族许多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一样，祖国鲜红的大旗上，也印染着她们的热血。我于是以《大姐与第一面红旗》为题，写了这篇短文，以作深切的怀念。

2007年11月27日

小康

卞建林

小康者，可像陶渊明一样耕作，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；也可从事文艺，琴棋书画上用心；或者养鱼鸟，种花草，优游度日；或者像李时珍那样著述，徐霞客那样远游，武禹襄那样习武。小康，意味着有比较充裕的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，而这种时间，是每个人自由发展所必不可少的。

鲁迅先生讲，人一要生存，二要发展。小康的生存状态，为发展提供了前提。相信在历史上，普遍的小康，是进至大同的一个必要阶梯。

受到战士的迎接。顾不上吃鸡蛋，大家争着要给孩子取名，队长没依。队长宣布：为纪念在岛上的战斗岁月和这群可爱的士兵兄弟，儿子小名叫崇崇。队长话音刚落，大家冲上前去，把队长高高地抛了起来，就像是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。

队长将这51份药方精心收藏起来，同时也收藏起战士51颗火热的心。在离岛的那一天，队长把这51份药方放到了队史室，连同那段激动人心的海岛岁月，那份今生今世难以忘却的战友深情，一同发酵，历久飘香。

明日谈
明清读一篇“兵儿子”的孝心》
守岛兵的故事

51张民间偏方

徐连宗 王明涛



夜光杯